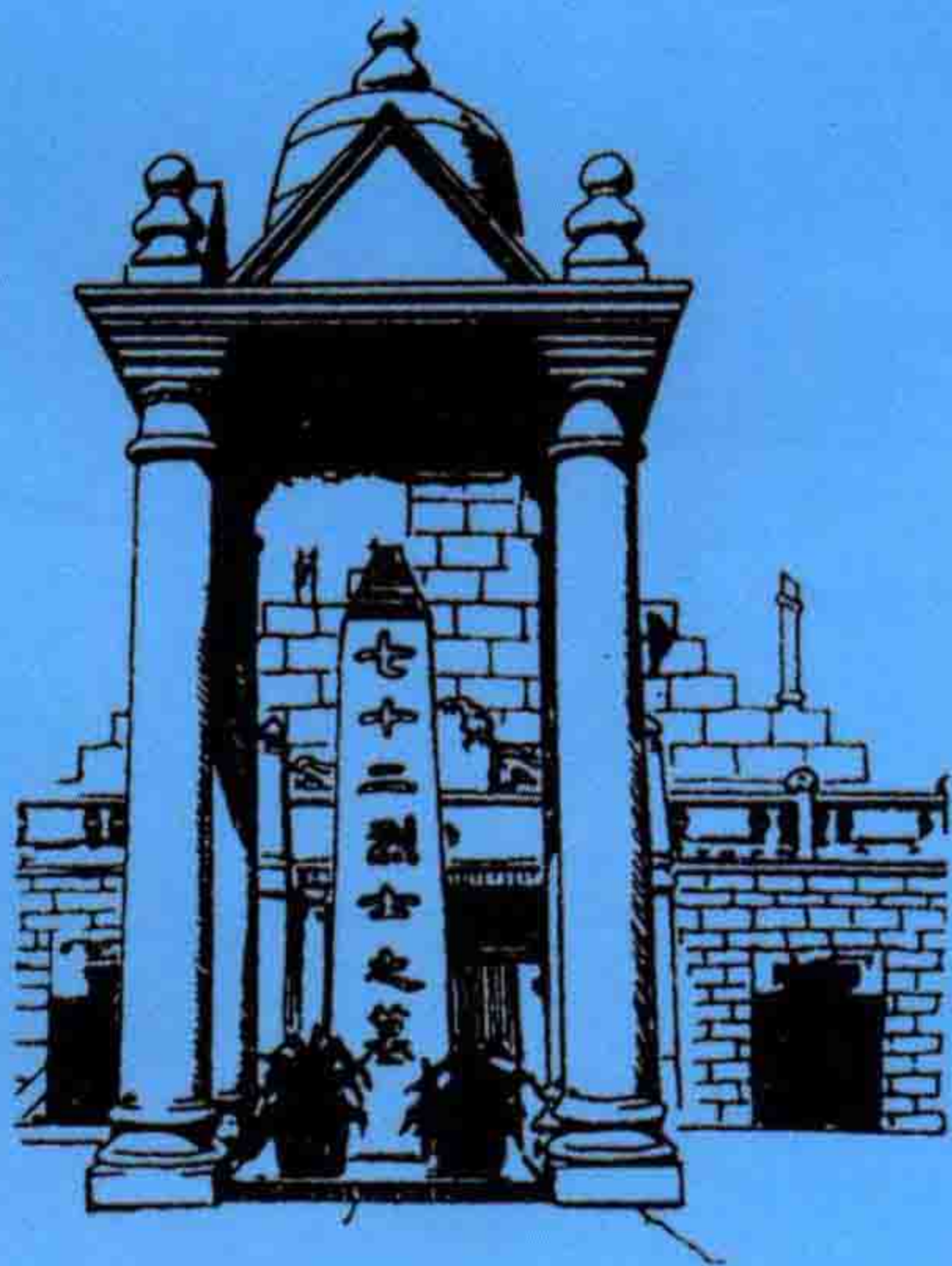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AI GUO ZHU YI JIAO YU CONG SHU

★第四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第四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本卷目录

黄花岗起义

一、山雨欲来	(3)
二、共图再举	(6)
三、筹措经费	(9)
四、设统筹部	(13)
五、购运枪械	(15)
六、定日发难	(20)
七、仓促备战	(25)
八、孤军奋战	(27)
九、黄兴脱险	(33)
十、功败垂成	(36)
十一、浩气长存	(39)
十二、碧血黄花	(44)

武昌起义

一、黑云压城	(51)
二、武昌起义	(62)
三、武汉保卫战	(73)
四、意义与教训	(95)

八一南昌起义

一、起义爆发前的国内形势	(99)
(一)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99)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	(101)
二、南昌起义	(108)
(一)革命力量集结南昌	(108)
(二)八一枪声	(114)

(三)起义胜利后采取的革命措施	(117)
三、南征广东	(121)
(一)从南昌到瑞金	(121)
(二)会昌战斗	(125)
(三)挺进潮、汕	(128)
(四)激战汤坑与潮、汕失守	(132)
(五)三河坝苦战与井冈山会师	(136)
四、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及其伟大意义	(141)
(一)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	(141)
(二)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	(14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一、山雨欲来 谁主沉浮	(147)
二、一次没有起义的起义	(152)
三、第二次武装起义	(157)
四、不屈不挠 重整旗鼓	(163)
五、排除干扰 定下起义决策	(169)
六、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光辉胜利	(174)
七、建立上海特别临时政府	(183)
八、蒋介石发动血腥政变	(186)

抗美援朝

一、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195)
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9)
三、捐飞机、捐大炮、打败美国佬	(204)
四、连续作战,痛歼顽敌	(208)
五、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	(213)
六、谈判桌上的较量	(218)
七、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226)
八、上甘岭战役的英雄	(231)
九、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233)

黄花岗起义

王凌云 编著

一、山雨欲来

1910年，黄花岗起义爆发的前一年。

这一年，中国的社会呈现出空前的大动荡。清政府的财政已经濒临绝境。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同各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大量的赔款使它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为了挽救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只有拼命挣扎。它在大量举借外债的同时，对国内人民横征暴敛，往人民头上猛加种种苛捐杂税。旧税之外又加新税，巧立名目，层出不穷，办学堂，设警察，修铁路，查户口，订门牌，等等，加捐派税，致使下层劳动群众叫苦不迭。他们为了生存，只有起而反抗。这种自发的反抗斗争，到1910年，就由1909年的149次增加到266次，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这一年发生的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和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都是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

抗捐抗税斗争，由来已久，波及很广。1910年，这种反抗斗争达到了高潮，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

莱阳地处山东中部，属低山丘陵地带，土地贫脊，农民生活十分穷苦。虽然如此，他们也逃不脱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正如一位农民所说：养一只鸡要捐多少钱，养一条狗要捐多少钱，生一个孩子也要捐多少钱；种地瓜要纳税，种花生要纳税。这个捐，那个税，数也数不清，记也记不住。巡警、衙役下乡催缴捐税时，乘机敲诈勒索，农民稍有反抗，轻则罚款，重则法

办。农民敢怒而不敢言，积怨越来越深。

1910年春，老天也不作美，莱阳一带严重春寒，没法播种，秋收无望。奸商乘机囤积粮食，农户十之八九缺粮。当地农民多有办社仓的习惯，就是各家在秋收后，自愿拿出一部份粮食，集中放在一个仓里，以备荒年时食用。这一年的春天，政府要这一带的农民补交人口税和牲畜税，柏林庄的农民就想用社仓的粮食来缴纳。谁知社仓的积谷早已被把持社仓的劣绅吞食。消息传出，群情激愤。5月21日，西北乡七百多饥民拿着粮袋子蜂涌到县衙门前，要求开仓放粮，免除捐税。虽然不久散去，但民愤没平。6月11日，农民又集合七、八千人，将劣绅王景岳的房屋烧毁，以泄民愤。7月2日，新任莱阳县县长派兵前往柏林庄，捉拿抗捐领导人曲诗文，群众闻讯，奋起阻拦，清军开枪，打死数人。被激怒的农民奋不顾身，同清兵搏斗。柏林庄的斗争，得到全县农民的声援，很快聚集了15万多人，自备干粮，冒着大雨，齐集在九里河滩，等待着更严峻的斗争。7月13日，大批清军开往九里河，向农民开炮轰击，打死农民300余人。14日，清军继续向柏林庄进攻，所到之处，狼烟滚滚，农民死伤者竟达1300人。

我们再来看看抢米风潮。20世纪初，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五省的饥民，向地主大户抢米的风潮，连年发生。1910年春，湖南由于粮食外运和商人囤积，粮价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大批饥民涌向长沙城内，老弱冻饿死在街头的每天都有数十人。由于粮价一日涨几次，4月11日这一天，竟有全家一起投水自杀的惨剧发生。第二天，米

价跌落到每升七十文，傍晚又涨到七十六文。这时恰有一个老妇拿了七十六文到一家米店买米，老板剔出其中两文小钱，说不能用，老妇只得回家换了两个，再来时，米价又涨到每升七十八文，老妇愤怒地向老板讲理。恰在此时，有两个泥木工人出钱买米，米店竟向他要每升一百文。两人大骂巡抚，被赶来的警察捕去，围观的群众愤而捣毁了米店。

4月13日，巡抚岑春煊派人前往城南查办。来人被群众痛打一顿，逃往城内。愤怒的饥民追到城内，涌到巡抚衙门外，要求政府压低米价、释放昨日被捕的泥木工人。群众越聚越多，岑春煊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十余人。次日，长沙全城罢市。一万多群众再次齐集巡抚衙门前，岑又下令开枪，群众怒不可遏，纵火焚烧了巡抚衙门。岑春煊在慌乱中逃命。

无论是抗捐抗税斗争，还是抢米风潮，1910年发生的次数最多，波及的地区也最广。全国已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

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创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在宣传鼓吹革命的同时，还在广东、广西和云南边界多次发动武装起义。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同广大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形成两股革命潮流，相互激荡，有力地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

1910年初，革命党人又在清朝的军队中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

新军是指清朝末年编练的近代化陆军、新军军官中有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知识份子。广州新军是从广东沿海招募来

的，一些革命党人也乘机应征。他们在军中传播革命思想。1909年夏，同盟会南方支部成员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决定在新军中进行联络，相机发动起义。

2月9日正是旧历年除夕，新军士兵放假进城，两士兵为刻印图章事同老板争执时，同路经此处的警察发生冲突，两名新军士兵被捕，进城的新军闻讯，前往警察局要求放人。人越聚越多，警察在门前严阵以待。清官员见此情景，前来劝解，将被拘士兵放回。新军士兵听说被拘伙伴被打伤，群情激奋。第二天，恰值大年初一，士兵们携带木枪、棍棒进城，见警察就打，清广州官员急忙下令将城门关闭。

倪映典仓促宣布起义，三千余名新军在倪的率领下向城内进发。清水师提督李準率军出城迎战。两军在东门外相持。清军诱杀倪映典，起义军大乱，待到再组织进攻时，由于兵心涣散、子弹缺乏、伤亡惨重，终于溃散。起义失败后，部份新军士兵被遣散回家。

二、共图再举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多数逃到南洋避难。南洋的革命党人经历了多次起义的失败，许多人产生了悲观情绪。

孙中山于1910年7月由美国经日本来到槟榔屿。孙中山敏锐地估量了新军起义失败后的形势，认为时机大有可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孙中山决定破釜

沉舟，再图大举。

1910年11月初，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赵声、胡汉民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槟榔屿，共同商量再次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他们三人都被目前种种困难所困挠，情绪不高。孙中山问他们下一步有何打算，他们都摇头叹息，相对无言。孙中山却从容镇定，对革命前途乐观。他耐心地安慰大家，说：一次失败有什么可以气馁的，我们过去失败过多次，比起今日，其困难更大。黄兴、赵声、胡汉民在槟榔屿看到亡命海外的同志穷困潦倒的境况，便对孙先生说：这里的同志，目前的生活费用都难以为继，哪里还有钱作活动经费呢？孙中山热情地鼓励他们说：“今日吾党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赵声接着说：如果事有可为，则非需数十万元不可。孙中山当即表示：如果众志成城不衰，财用一层，吾当设法。他自告奋勇，担当筹措款项的艰巨任务。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强烈地感染着在坐的每一个人。大家表示愿意支持孙先生再次组织武装起义的主张。

孙中山亲自发信，约集南洋各埠及国内部份同志来槟榔屿开会。各地同志接信后，纷纷前来。11月13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的骨干在槟榔屿打铜街一二〇号党部举行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及当地党人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李孝章、邓泽如，还有国内东南各省代表谢逸桥、谢良牧、何克夫等。会议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第一，款项的筹措。孙中山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反复强

调筹足经费的重要，说：“款项多一分，则筹备足一分，吾党不乏热心之士，前此力分而薄，且未先事为备，每有临渴掘井之患；今举全力以经营，鉴于前车，故为充分款项之筹集。事济与否，实全系之。”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认为筹足款项是关系成败的头等大事。会议决定先筹足十万元大款。

第二，再次发难的地点选在哪里？新军起义失败不久，孙中山考虑下一步行动时，就曾给黄兴写过两封信，提议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地点还应该选在广州。黄兴原来也有一番考虑，他曾领导过云南河口起义，在那里还有一部分力量，况且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清军难以进攻。所以打算再次在云南发动起义。接到孙中山先生的信后，他同赵声反复商议，同意孙先生的意见，他在复信中说：“省城（指广州—编者）一得，兵众械足，无事不可为。”9月5日，孙中山写信给友人咸马里，说：“大多数领导皆主张一天工始即攻取广州，而极不愿意采取其他行动。我亦认为此城自始即为我们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先攻此城比之后来攻取将远为容易。”由此可见，在这次会议前，关于发难地点，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是经过反复斟酌的，这次会议就把广州作为再次发难的地点确定下来。

第三，队伍的组织。大家一致认为，革命党人在广州新军中有较好的基础。起义失败，尽管力量遭受一定的损失，但赵声曾经担任过标统（相当团长）的新军第二标和第三标（相当于团）一营中的革命力量依然保存着。所以，会议决定再次起义依然以新军为主力，同时联络巡防营和民军。这次会议还吸收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挑选五百名革命同志为选锋（敢

死队),负责发难。

第四,攻取广州后的军事计划。对此,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决定攻下广州后,即由黄兴率领一部份军队,经湖南到湖北。因为黄兴曾在湖南创办华兴会,在两湖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本人在这一带也颇有声望;赵声率领另一部份军队经江西到南京。因为赵声曾担任过南京新军的统领,至今他同南京新军的感情还很深。待到两军分别到达湖北和南京后,长江流域的各省革命党人便发动军队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指清王朝。

会后,孙中山即派赵声回香港,联络广州新军,派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在南洋筹款,他自己则暂留槟榔屿,并立即致函美国、加拿大、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各党部,要求他们进行募捐。

广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

三、筹措经费

兵马未动,粮秣先行。组织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将需要一笔巨额的经费。它包括购置、运送枪支、子弹,参加起义人员的车船费、生活费及各项活动经费。槟榔屿会议汲取前几次起义多因款项准备不足,临渴掘井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决定全力以赴,筹措经费。

孙中山指派胡汉民负责东南亚地区的筹款工作,邓泽如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地区负责筹款。会议结束后,他们便分赴

各地，在各界爱国华侨中进行筹款活动。

胡汉民于12月初在东南亚各埠活动，奔忙了十几天，所筹款项不足一万元，十分着急，便写信约邓泽如前来，共商办法。12月18日，邓泽如来到新加坡，25日，在晚晴园召开筹款会议，一百余人到会，会议由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副会长陆秋露主持。胡汉民首先致词，说：“此次孙先生决定大举计划，实汉族存亡所关，现内地同志均竭力筹备，待机而动，尤望海外同志竭力资助、以底於成。”邓泽如报告他游历十几个城市，革命同志踊跃捐款的情况，会场情绪十分热烈，当地巨商沈联芳当场捐出一千元，其他人也量力而行，捐出了三千元。

12月31日，黄兴从仰光来到新加坡，见到胡汉民，知他只筹得一万余元，与计划相差太远，十分着急。当他得知邓泽如已去马六甲，便急急赶到马六甲，不料邓已回坝罗，黄兴又追到坝罗，见到邓后方知时至如今才筹得一万余元，他痛切地向邓泽如表示：如果在英属各埠不能筹足五万元，则广州再举的全部计划将会瓦解，这样的话，我也不必回香港了，只有去实行个人暗杀了。说罢，泪如雨下。邓泽如安慰他，说：我一个多月以来，走遍了十几个地方，同各方人士接触，大家都十分热心。目前只是一时没能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数字罢了，不要着急。他劝黄兴亲自到各地走一走。

黄兴同朱赤霓等即刻前往芙蓉，住在矿务会馆。1911年元旦，黄兴约集当地革命党人和华侨三十余人，在安泰店开会。黄兴首先向大家说明：起义时间已经迫近，急需大量经费，假若英属各州不能筹足五万元，起义的准备工作便不能进行。

与会者听后,纷纷表示愿尽力而为。谭德林当场捐出五百元。这时,恰好邓泽如赶到,他在会上历数筹款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谭德林听后,又拿出一千元;同时,宣布再捐出价值五千元的货物。

第二天,黄兴同邓泽如来到吉隆坡,会见商人陆秋杰,陆捐二百元,其他商人大都借故推托。次日,他们来到怡保,这里是华侨集中的地方,革命党人也不少。这一天,郑螺生在决醒圆宴请李源水、李孝章等热心赞助革命的人士,黄兴在会上陈述筹款中的种种困难,在有的地方,几乎是挨门挨户地劝说,但至今所得却同所需还相差很远。他沉痛地说:我同赵声等人,舍弃生命,在所不惜,但为大局计,不能不尽力筹足款项,以作起义的物质保证。若是冒险行事,则苦了人民,与心不忍。他殷切期望各位能够鼎力相助。在坐的诸位,在过去的几次起义中,都曾经慷慨捐资,这时听了黄兴的一席话,又深受感动。郑螺生、李源水、李贵子、黄怡益各自认捐一千元,黄怡益的妻子何氏也认捐五百元。郑螺生当场表示,愿将他在福建、江苏的铁路股票变卖,所得款项捐助革命。一席之间筹得如此多的款项,黄兴、邓泽如甚感欣慰。郑螺生、李源水等人向黄兴表示,英属各埠,一定要筹足五万元,已经募捐得到的款,保证年内汇到香港,决不延期。

1月9日,黄兴一路风尘来到新加坡,准备返回香港。第二天,他写信给邓泽如,对他热心奔走筹款,表示感谢,并要求他将各处寄来的款项,务于年内汇到香港。

槟榔屿会议前夕,孙中山就曾写信给友人咸马里,委托他

在美洲筹款。会议结束后，孙中山暂留槟榔屿，11月中旬，召集当地革命同志及爱国华侨开会，共同商议筹款一事。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号召“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并表示：“吾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语气决绝，感人肺腑。与会者当场认捐了八千元。

南洋英国殖民当局以“恐于地方治安有碍”为理由，命令孙中山离开此地。孙中山于1910年12月6日经科伦坡前往美洲。临行前，他写信给邓泽如、李萝生，再次申述筹款对于革命成败的重要。

12月19日，孙中山到达纽约。此后，他奔走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在革命党和华侨中间宣传革命，动员捐款，没有一日休息。截至1911年3月，他已募集了所需款项的一半。

孙中山来美洲前，这里已经由陈耀垣、冯自由、黄芸苏负责运动筹款，进行比较顺利。待到孙中山来后，经他多方鼓吹，捐款者更加踊跃。以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为例。美洲华侨多有洪门致公堂组织，他们都热心赞助革命。维多利亚致公堂是加拿大各城市致公堂的总堂，自己置有公产。2月22日，孙中山从温哥华到达维多利亚，24日，维多利亚致公堂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会上慷慨陈词，说明革命时机紧迫，急需大笔款项，希望大家踊跃捐款。大会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将该堂堂所连同地皮一并抵押给银行，把一万二千元押金全部捐献出来，作为广州起义经费。加拿大各地的革命人士和爱国华侨在这次募捐运动中，共捐款七万余元，居各

地华侨捐款之首。

经过几个月的多方奔走，单凭他们的一张嘴，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历经艰辛，终于募得了十五万七千二百十三元。

四、设统筹部

槟榔屿会议决定设立统筹部，作为发动和领导起义的总机关。

会议一结束，赵声便立即返回香港，南洋筹款稍有头绪后，黄兴也于1911年1月18日回到香港。他们受孙中山委托，主持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1月26日，革命统筹部在香港成立。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

统筹部下设八个课，由同盟会的骨干分别担任各课课长。一，调度课，负责运动新、旧军队。由姚雨平任课长；二，交通课，负责联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福建、云南各路，由赵声兼任课长；三，储备课，负责购运军械，由胡毅生任课长；四，编制课，负责拟定规划，由陈炯明任课长；五，秘书课，负责一切文件，由胡汉民任课长；六，出纳课，负责出纳财政，由李海云任课长；七，调查课，负责侦察敌情，由罗焯扬任课长；八，总务课，负责其他杂务，由洪承点任课长。其余各同志，则分派在各个课任职。

统筹部总机关设在香港跑马地鹅井三十五号，另外，在跑马地九十五号、湾仔六十八号、六十七号三个地方设有分机关，协助总部工作。在中环路摆花街设立实行部，派喻培伦（云